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三卷 (1949—2000)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刘欣森 孟湘砥

副主编 罗春晖 胡国强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G527.64
F525.1
:3

湖南教育史

第三卷 (1949—2000)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刘欣森 孟湘砥

副 主 编 罗春晖 胡国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教育史 / 冯象钦, 刘欣森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ISBN 7-80665-271-X

I. 湖... II. ①冯... ②刘... III. 教育史—湖南省
IV. G5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0057 号

责任编辑 张铁燕 皮朝霞

封面设计 胡 颖

湖南教育史

《湖南教育史》编委会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875

字数: 2081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665-271-X

G·296 (全三卷) 定价: 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 422001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导 言

从 1949 年 8 月湖南和平解放到 2000 年的 51 年中,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逐步改变了湖南贫穷落后的面貌。湖南的教育事业也在艰难曲折中发展、提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一)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到 2000 年,湖南已加倍实现了 20 世纪初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教育理想,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九年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教育与 1949 年比,幼儿园增长 288 倍,在园幼儿增长 644.21 倍;普通高中增长 7.34 倍,在校学生增长 57.41 倍,全省每万人口中的在校普通高中生由 13.62 人增加到 95.79 人;普通高等学校增长 10.4 倍,在校学生增长 97.34 倍,全省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由不足 1 人,增加到 38.75 人。特殊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有各类特殊学校 57 所,年招生 0.2090 万人,在校学生 1.2179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 539 所,年招生 9.3447 万人,在校学生 21.3898 万人;成人高校 31 所,年招生 9.8739 万人,在校学生 20.1191 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31312 所,年招生 228.8457 万人。

(二)教育体系基本完善。2000 年全省的 88618 所各级各类学校,已基本形成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妇女教

育,从学历教育到业前训练、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较为完整、相互衔接和沟通的教育体系;各类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和学校的地域布局也基本合理,初步形成了适应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教育体系。

(三)办学条件显著改善。2000 年全省普通大、中、小学校舍建筑总面积由 1949 年的 213 0.7 万平方米增加到 8533.0985 万平方米,生均占有面积小学由 2.5 平方米增加到 6.57 平方米,中学由 4 平方米增加到 8.43 平方米,大学由 29 平方米增加到 34.3 平方米。全省还新建和扩建中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校舍 974.9649 万平方米。全省普通中、小学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19.34 亿元,生均 183.20 元;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13.051393 亿元,生均 5156.94 元。全省生均占有图书馆、室藏书小学 13 册、中学 17.48 册、普通高校 99 册。

(四)师资水平显著提高。2000 年全省各级各类教职员人数由 1950 年的 10.93 万人,增加到 79.9482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63.7579 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生活如何清苦,无论经历什么政治风雨,都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教育事业,不愧为人师表。”^① 专任教师中的学历合格率小学为 97.98%,初中为 86.55%,高中为 65.74%,其中小学教师中具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相当于讲师)的占专任教师的 38.09%,中学教师中具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相当于副教授)的占专任教师的 5.04%,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教授、副教授占 36.35%,并拥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32 人。

(五)教育质量全面提高。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的主流是校风优良,学生勤奋学习,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生活朴素。2000 年全省初中、高中毕业会考的成绩合格率分别为

^① 引自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84%、81.9%；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59.4%，高考成绩处于全国前列。国际中学生数、理、化、生、信息等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湖南从1990年开始历届共获金牌23块，银牌13块，铜牌2块，为各省之冠。1985年进行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至1985年33年间，全省7—17岁学生的身体形态发育每10年的增长量，身高男生为2.85厘米，女生为2.23厘米；体重男生为1.27公斤，女生为0.79公斤。而1997年与1985年相比，全省中小學生身高平均增长1.39厘米，体重平均增加1.7公斤。51年来，湖南体育健儿在国内外各项体育竞赛中共获得全国冠军645.5个，亚洲冠军194个，世界冠军90个，这些体育健将都是在中、小学打好技能基础的。

(六)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改经验和科研成果。湖南省、市、县三级教育研究机构健全，现有教育专兼职教研员8万人，从事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的中小学数百所。有的成果如“汨罗市推行素质教育”、郴县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邵阳市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十百千万工程”、怀化地区的农科教结合、小学特级教师马安健的“复式教学研究”、滕昭蓉的“童话引路”作文教学法研究、湖南师大附中和一师附小的“教育实验与全面发展研究”、师大教育系教授郑和钧指导的“协同教学”以及“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部件识字”，等等，都对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如中南大学陈国达教授创立的地洼学说、国防科大研制的银河巨型计算机、湖南医科大学的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湘潭大学的“二维定向凝固整体成型”高技术研究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饮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是在安江农业学校工作期间起步并打下基础的。现在全省已有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

(七)培养了大批各条战线的骨干和有文化的建设者。据统

计,自 1950 年至 2000 年,全省各级学校共培养小学毕业生 4622.9027 万人,中学毕业生 2652.3798 万人,普通中专毕业生 94.0117 万人,成人中专毕业生 86.7427 万人,普通高校毕业生 63.2916 万人,成人高校毕业生 64.0173 万人。他们为湖南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湖南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骨干和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技术、科研及教学骨干等,大都是建国以后湖南自己培养、成长起来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51 年,湖南教育事业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受过“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既有高歌猛进之时,也有折腾受挫之日,但发展进步总是主流。51 年的当代湖南教育史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湖南教育的稳健发展阶段(1949—1956 年)

1949 年 8 月湖南和平解放以后,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临时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进行改革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采取“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接管旧有公、私立学校,对旧有学校教职员实行“全部留用”和对年老与失业教师实行救济的政策。结合接管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思想教育。这些举措,有利于稳定大局,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拥护。

1950 年 1 月,接管旧有学校的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湖南逐步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教育改革。

第一,组织教育工作者开展一系列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并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在实践中接

受教育。当时,刚从民族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走过来的湖南广大教育工作者,政治热情很高,要求学习,而党安排的学习内容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论述等,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方法上也做到了以理服人,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大教育工作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以后,大都能自觉地联系自己的经历,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第二,推行教育向工农开门。一方面,各级学校积极向工农子女开门,在城乡广泛开展劝学运动,初中以上学校优先录取工农子女,并设置人民助学金,允许工农超龄子女入学,对学习有困难的工农子女加强个别辅导等。同时鼓励、支持地主、富农子女入学,不准歧视。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工农成人教育,广泛举办工农业余文化学校,有计划地举办脱产学习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到1957年,全省成人教育初步形成了从扫盲、小学、中学到高等学校比较完整的体系。

第三,调整学校设置和管理体制。1950年初,湖南将原有规模小、办学条件不足的6所高校并为2所,其中合并后的湖南大学成为师资力量雄厚、设备比较齐全,拥有7院、25系、1个专修科的规模较大的综合大学。1952年全国统一进行的院系调整后,湖南大学虽被肢解,但湖南的高等学校又增为6所。中等职业学校由原有的129所调整为26所,原有学生文化起点过低、办学条件很差的初级职业学校和简易师范学校全部撤并;管理体制由省教育部门独管改为省、地共管。中学由原有的321所调整为240所,管理体制由省、地两级分管改为地、县两级分管。小学则只适当控制增设新校,并于1952—1955年分期分批进行整顿,建立各项管理和工作制度,纠正各地任意抽调小学教师参加土改等中心工作的

混乱现象,并将小学办学经费列入国家计划。与此同时,湖南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了初、中等学校的校舍改造与新建。1952年国家开始对校舍建设投资,是年投入765万元(按旧人民币折为新人民币计算,下同),占湖南全部基建投资的8.7%;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投资3130万元,占全省基建投资的3%。由于校舍的改造和扩充,办学规模和效益有了显著的扩大和提高。

第四,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加强和改进教学工作。从1950年开始,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逐步成为湖南教育界的热门书,形成教育科学知识的大普及。在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指导下,湖南广大教育工作者广泛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如:建立教学研究组(室),组织教师钻研教材,集体备课,定期举行观摩教学;高、中等专业学校注重实践环节,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中小学注重实验教学和教学的直观性,讲究课堂复习巩固,开设劳动技术课,开展课外小组活动等。尽管当时苏联的教育理论,尚未突破赫尔巴特以来的传统教育理论体系和教学模式,但这种模式确实有助于系统的传授知识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对湖南教育质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湖南教育人士认为,这一时期是湖南教育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湖南教育的曲折前进阶段(1957—1966年)

这一阶段,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缺少经验,加以“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湖南教育事业在迂回曲折中发展。1957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教师。接着又在1958年春开展“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运动,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也伤害了一些教师和干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急于求成,各类学校

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增加,名不副实,大起之后继以大落,造成工作混乱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在同时进行的“教育革命”中,师生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盲目改革中、小学学制,不切实际地推行体现“大跃进”精神的“双高(高速度、高质量)”课,严重打乱了学校教学秩序,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下降。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部制定了“高教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等工作条例,湖南据此对教育事业和政策进行调整,大量压缩学校数量,落实团结知识分子政策,给被划为右派分子中的大多数教师摘掉右派帽子,给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的教师和干部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在各级学校普遍开展“尊师爱生”、“学雷锋”等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到1963年,全省教育事业又转上正常轨道,教育质量迅速回升。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湖南教育遭受严重破坏阶段(1966—1976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秩序混乱,广大干部、教师受到批斗,有的被开除,有的被下放劳动,个别的被迫害致死;学校设备、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文化课被削弱甚至取消,学校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砸烂”。1970年,又响应所谓“侯王建议”,实行“读小学不出生产队,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盲目增设中学,增设各种类型的“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校舍不足,就由上而下逐级挤占,因陋就简;师资不足,就由下而上逐级提拔,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高中教师教大学,小学则大量吸收未经专业训练的民办教师。1971年9月,“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狂叫“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以此为依据大搞所谓“与17年对着干”的“教育革命”,大肆摧残广大教师。“文化大革命”使湖南教育事业元气大

伤,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使他们知识贫乏、思想空虚、心灵扭曲,以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湖南有 94 万青年工人、12 万青年教师需要初中文化补课,84 万青年工人需要初级技术补课,造成的严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四)历史性转折时期,是湖南教育拨乱反正、调整整顿,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清理场地、准备条件的阶段(1977—1982 年)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两年的徘徊、斗争,直到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清除“左”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示,深入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各项事业的调整、整顿,为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条件。

湖南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但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较深,只限于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一些具体罪行,且极不深入。1977 年 8 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推翻了“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打碎了精神枷锁;1978 年夏秋,全国广泛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湖南虽然采取不表态、不干预的态度,但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还是受到重要启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湖南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在继续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开始着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全省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共调集 7000 多名干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或办公室,对 50 年代以来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处分教师的案件一一进行复查甄别。全省仅中、小学教师在上述政治运动中被清洗出队的就共有 6 万多人,甄别以后,平反

51637人,占被清洗人数的85.3%,其中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1979年,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教育部的具体指导下,中共湖南省委又推出一项对拨乱反正工作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重大举措——总结推广桃江县委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的经验,给全省各级干部上了破除“左”的思想影响的生动而深刻的一课。1981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湖南工作座谈会以后,湖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教育战线的领导干部思想更加解放,省委领导带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使拨乱反正不断深入发展,并开始进行教师队伍和教育事业的调整整顿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湖南教育事业内部的比例严重失调,突出表现是:普通中学极度“虚肿”;中等教育结构极度单一化;小学教育被严重削弱;高等教育规模缩小,质量下降,专业、层次结构极不合理,学校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成人教育的扫盲和初、中等教育事业停顿。针对这些问题,湖南对基础教育的调整采取“压缩中学,加强小学,保证重点,优化结构”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的调整采取“稳妥发展数量,大力调整专业、层次结构,实行合理布局”的方针等。到1982年,普通中学的“虚肿”大大消除,中等职业教育有所发展,小学得到加强,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和地区分布得到调整,成人教育也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在教师队伍的整顿方面,湖南实施“调整、补充、培训、管理”的八字方针,首先将7万多名文化基础过低的教师调整出教师队伍,适当补充一些高中毕业的青年,同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大规模培训,到1985年终于使全省中、小学教师基本达到胜任教学的水平。通过拨乱反正、调整整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恢复了活力。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是湖南教育事业改革开放、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新阶段(1982—2000年)

在 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此后到世纪之交的 2000 年,是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并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新时期,也是湖南教育事业深化改革、持续发展、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是建国以来湖南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教育质量显著提高的时期。回顾这个阶段 18 年的湖南教育工作,与以往 33 年相比,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加强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正确领导。首先是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列入议事日程和工作日程,举凡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和举措,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如毛致用、熊清泉、刘正、陈邦柱、王茂林、杨正午、储波等无不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然后由省委常委和政府常务会深入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和工作部署。其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1983 年各级政府机构改革以来,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和领导教育的水平日益提高,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比较符合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因而能带动教育车轮滚滚向前。

第二,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积极支持。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和财政弱省,在这种省情下发展教育事业,困难是较多的。而改革开放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湖南广大农民渴望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迫切要求自己及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宁可省吃俭用,踊跃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广大城镇的社会各界也积极支持发展教育事业。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湖南中、小学教职员 50—60 万人中,民办教师约占一半,他们的工资主要是由农民负担的。到 2000 年,湖南中、小学的校舍总面积达到 7450 多万平方米,所耗资金巨大,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农民集资提供的。

第三, 教育的不断深入。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开始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长期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局面。接着, 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并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面向 21 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 湖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如划分省、市、县、乡四级管理教育的职责; 制定保证教育经费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 深化学校内部的管理改革、课程改革、考试改革;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外语教育, 开展综合课和研究性学习; 进行教师和校长全员培训, 实行任职资格制度; 改革各级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 根据计划生育使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及时调整中、小学布局;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 等等, 都对提高办学效益和发展教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成人教育, 80 年代推行三级办学, 即县办农民中等专业学校或农民技术学校, 乡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村办农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 90 年代县、乡两级的农民学校发展成为培养人才、推广技术的农科教中心, 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学改革方面, 湖南在 80 年代引进、推广了前苏联教育学家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等教育理论, 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90 年代又总结和推广了汨罗市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 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这些都对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已成为社会性的问题, “应试教育”的弊端远未消除。

第四, 教育事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在当代湖南教育史中, 除建国头七年教育事业保持稳健发展以外, 从 1958 年开始, 教育事业多次出现大起大落。而自 1983 年以来, 湖南教育坚持在改革中求

发展,始终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重中之重”;高中教育着重调整结构,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则以扩大内涵为主,稳步发展;县(市)、乡(镇)的教育发展计划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从而使湖南教育事业得以顺利地、持续地、稳健地向前发展。

此外,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湖南的地方教育立法也日益完善,依法治教的方略在湖南开始实施,为湖南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回顾新中国建立后 51 年的湖南教育艰难曲折而又不断前进的发展历程,我们既要看到促进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更要总结导致湖南教育事业遭受挫伤的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一)必须正确认识教育的社会属性,完整掌握教育的社会功能

教育,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石,既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又有生产力的属性。它与一定社会的政治当然有着紧密联系,但又绝不只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功能,还具有经济、文化和育人的功能等。而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湖南执行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作方针,且这一方针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教师的积极性和学生的个性受到严重压抑。“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走向极端,否定知识,摧残教师,破坏学校设施,教育仅仅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情况,一时遍及全国,而湖南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还更为突出,例如 1964 年的“龙普腾事件”,“四清”运动后期和“文革”初期清理教师队伍的三十字方针的提出,都是全国突出的典型。而所有这些又都发生在

20 世纪的 50、60、70 年代,正是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国内阶级斗争本已基本结束,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的时候,这就使我国教育长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致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1978 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这样,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倾向从根本上得到纠正。此后,我们对教育地位和教育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到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到十五大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文件和讲话反映,经过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的反思,我们对教育的地位和功能已经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教育究竟应以社会为本位还是以人为本位的长期争论也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在二者之间构架了一座互通的桥梁。在这种先进的思想认识指导下,湖南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倍重视和支持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十分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力求把学生培养成适应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从而使湖南教育在近 20 年内形成改革、发展的“黄金时代”。当然,在今后的实践中,问题还会不断地出现,如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对于高学历的片面追求可能还会加剧;又由于市场经济的牵引,办学营利的现象可能滋长,等等。但只要我们对于教育的重要

地位和社会功能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总是可以找到的。

(二) 必须加强教育理论建设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办好教育,需要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但其中最关键的条件,一是教育理论建设,二是师资队伍培养。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师资队伍的培养是发展教育的永恒主题,只有有了好的师资,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提高教育质量。改革开放以前湖南教育的多次折腾,一方面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认识不够,没有正确把握教育的发展规律,更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继承、质量与效益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充分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伤害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不但重视学习、传播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促进教育观念的更新,而且重视总结、推广本省教育改革经验和科研成果,树立“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思想,推动中、小学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验,走教育改革创新之路,并通过召开全省性的教育改革经验交流会和组织全省大规模的教研教改成果及经验交流和评奖等举措,激励广大专家学者、教研人员和中小学校长、教师结合教改实践撰写教育专著和论文,把教育改革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同时,重新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政治上信任,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培养、培训和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方面,湖南十分重视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院校的建设,师范本科院校、师范专科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院校的建设都处于全国先进行列,国家教委多次在湖南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湖南的经验。这样,教育理论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都上了新的水平。在正确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广大教师以教研促教改,以教改促教